

第三辑



瞻顾文丛

故雨新知

俞明 著



俞明

福建人民出版社



瞻顾文丛

故雨新知

俞明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故雨新知/俞明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9 (2002.4 重印)

(瞻顾文丛)

ISBN 7-211-03938-8

I. 故... II. 俞... III. 散文 作品集 中国—当
代 N.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0269 号

瞻顾文丛

故雨新知

GUYU XINZHI

俞明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625 印张 4 插页 186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4000

ISBN 7-211-03938-8

I·82 定价: 17.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主催者语

筹划本文丛时，出版社的编辑曾要我担任主编，我不敢当。“不敢当”并非佯作谦虚状的公关语言。我是个老脑筋，如果尸“主编”之名而不实干，那很无谓。要实干，那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且不说能力。十多年前我曾当过一次上海辞书出版社《青年文学手册》的主编之一，经手的文稿从头至尾逐字细读不说，还得提意见、动手删改乃至整个条目改写，没人写的要自己增写，那苦头至今难忘。当然，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除我之外都是一时人选，用不着而且我也没有本事提意见，乃至妄加是正，可是光通读一遍，我也吃不消。空担名义，又何苦来！

当今出书，通行“策划”之名，我一想也不宜仿效。我能策划谁，谁又能听我的策划？而且，一提“策划”，还令人想起“策划于密室”这句不祥的话，有点小小的余悸。因此，我就提出，我可当“主催”。

“主催”一词是日本传入的，犹言组织人、发起人、召集人。三四十年代常用，近年来少见，以至一个年轻朋友曾为此而向我质难，以为是我杜撰，逼得我专撰一文以应。本文丛的作家多数是熟人，我的确又函又电，主过催；有的如于光远、严秀两位，我还苦苦哀求过，算是尽了主催之责的。

文丛的命名我曾征询过作家们的意见，邵燕祥曾提议以

“长春藤丛书”为名。考虑到有几位作家还很年轻，不全是老头，放弃了。于是由主催人定了“瞻顾文丛”这一不抢眼的平实的名称，文丛同人均无异议。

任何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都该有认真的前瞻和回顾，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瞻望前途和回顾历史尤有其除旧布新的现实和观念上的郑重性。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不了解昨天和今天，就不能预知明天。”回顾过去、反思历史才能保证理性的前瞻，才能避免在空洞的“向前看”的口号下屡屡为纠缠人的历史所困扰，也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选择。

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长期以来都是本着良知、秉持公心地向社会执言者，他们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言谈多年来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和曲学阿世者辈不相为谋，依我看，可以若干地代表社会、民族、人类的良心。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指陈和对未来的期望必将给读者提供独特的启示，更不说赏聆他们论辩中的优美谈吐的愉快。

各种丛书都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体例，但本丛书则完全是开放式的，自由不拘。至于各位作家的文风各异，那更不在话下。

主催人谨向加盟的各位作家致感谢之忱，并代表文丛的作家向读者致新世纪、新千年的祝贺。

结识俞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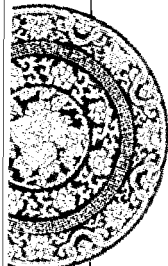
俞明，我是先识其文，后识其人的。

由于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推荐，俞明开始给我所在刊物的副刊投稿。先寄过几篇杂文，用的是吴人这个笔名，后来又陆续寄来了一些散文。我很奇怪怎么先前没有注意到俞明这位作者。看到他寄来的第一篇杂文——《不白一白不》——我就喜欢上他的作品，没有咋咋呼呼的浮器，没有教师爷式的卖弄，也没有官老爷式的蛮横，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却又绵里藏针，柔中有刚。后来看到他写人物的散文，更是拍案叫绝。在我联系的作者中，来稿不嫌其多的，除几位人所熟知的名家，只有两位，一位是俞明，另一位是至今未曾一面的平白。平素我最怕官员的文章。一来他们往往自己没有时间写或没有能力写，于是借重秘书。秘书若非里手，就照抄文件。文章固然字字有来历、句句有依据，奈何了无新意，乏味之极。既然已经读过了文件，又何必再读这些文抄公的大作？二来官场的通则是呆板，行事呆板，语言呆板，面目也呆板，所以有“人无风趣官多贵”之说，而可有可无、可看可不看的文章也就叫做“官样文章”了。

偏偏这两位都当着官，俞明的官后来知道还不算小，是苏州市委宣传部长，后来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是，那文章却写得清丽脱俗，风致极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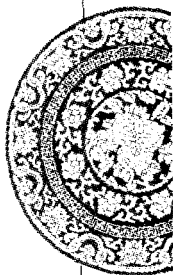
读着他的文字，我常常悬想其人。





我想，热衷仕途的人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整天忙于奔走、看风向，光是捉摸领导对自己怎么看，周围有哪些对手要应付，已经形神交瘁，哪里还能体味到俞明文章中那些情趣？年轻时读《牡丹亭》，对“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一语体会不深，乃至阅世渐深，才知道富贵中人，锦衣玉食，前呼后拥，车水马龙，但也往往因此败坏了审美的趣味。俞明若非淡泊名利，怎能使山水、园林、方物、民俗，一经他手，便涉笔成趣？能对自然、对文化有一份欣赏，有一份理解，实在是一种福分。

做官当老爷的人也是写不出这样文章的。俞明的随笔散文多写人物，关注所在，大致不出他的工作范围，但没有一篇是颂上的时文或应酬之作。在他的笔下，有落拓不羁的饱学之士，有悬壶济世的名医，有身世坎坷的艺人，有身怀绝技的微雕师，有不通世事却事业有成的书痴，有出生入死、老而弥坚的抗日战士，还有蒙冤受屈的书生……他说：“我认识一些普通人，平凡质朴，但都算得上是人物，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有可能，我也很想描写他们。”可见，他同他笔下人物，大多有很深的交谊。如果不是心相知、意相通，他是不会对他们有那样真切的了解和创作的冲动的。我接触过这样一类干部，他们可以有許多下属，但没有一个挚友。谈到“治下”的各色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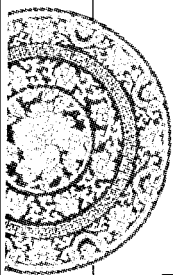


等，哪怕是遐迩闻名的人，所知所晓也不过是各种汇报材料的内容。他们只是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管理的对象，不要说理解，有时连起码的尊重也没有，更不要说用心血描述他们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了。

没有深厚的文化素养，也是写不出俞明这样文章的。他在苏州工作，对同苏州有关的种种文化，无论是昆曲、评弹、园林、刺绣、绘画、方物，都谙熟于心，对它们的渊源，传承，人物，掌故，都能如数家珍。所以，他的散文，就像苏州这古城一样，有一种浓浓的文化风韵，再加上他温婉曲折、细腻尽情的描述，不仅人物、语言，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场面，也写得情味十足。

我还在想，俞明一定是一位承受力很强的人，不然，他怎能收拾起那样多的悲哀、痛苦、坎坷，欢喜、激情，然后让它在笔下潺潺流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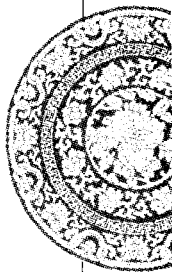
这许多猜想，到后来总算有机会得到印证。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择暇去看看久违了的苏州，顺便也拜访了俞明。他那时住在一条小巷里，七曲八绕，上灯时分，又是雨夜，若不是有人带路，真不知要找到何时。房子的格局不大，家具也十分简陋，坐在一张小木椅上，喝着当年的新茶，听着他不紧不慢一口带着浓郁苏州味的普通话，那情味同我的想像颇为吻合。闲谈中，我才知道他中学时代参加地



下党和以后的种种经历。他要年长我十多岁，又是初次见面，但谈得十分投机。

尽管我的上一代曾在苏州生活过很长一个时期，但我对苏州却只是少年时代淡淡的印象。承他情，拨出了几天工夫，像对老友一样领我游览了苏州。由于他的向导，我得以拜访了他笔下的几位人物，领略了他们之间那份深厚的情谊，也游览了他称之为“残芥”的、虽非大雅但别有一番滋味的小小园林，以及一些他认为须得一看的地方——大都不是旅游向导带着赶场的风景。经他一番指点，我才知道什么叫深入，什么叫挚爱，什么叫钟情，也才知道俞明为什么能写出那样一种极具个性的随笔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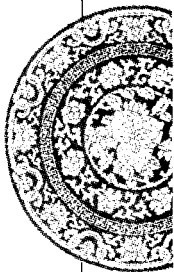
苏州一别，又是多年。这期间听说他得了癌、动了手术；又听说他斟酌医嘱、按照自己的方法锻炼，恢复得很好；还听说他又能拿起笔来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不久，渐次看到他在《大公报》上写山水人情的专栏，在《新民晚报》上连载的纪实文学，还有他陆陆续续写出的他所钟爱的人物。看着这些文章，我想，在他身上总有些我似曾熟识的身影，这是许多早年活跃在思想文化界的共产党人的身影。他们自己有文化，也珍惜文化，同文化界、知识界有着广泛的、深入的联系，在切磋琢磨、促膝交谈中便沟通了思想，团结了朋友。他们没有官僚气，没有教条气，没有不懂装懂



的矫情，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他们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样的优良传统，要能传诸后世才好。思想文化领域原本是不能靠机械的平均和少数服从多数来造成一统天下的——这是列宁的观点。以为凭借权力就能在思想文化领域胡乱指挥的，是没有文化的蠢人。

俞明的又一本文集《故雨新知》就要出版了，仍旧是他熟悉与钟爱的人物，仍旧是他惯有的风格，如果同他的另一本《姑苏烟水集》同读，在你面前展示的是一个个人物，一页页历史，一番番悲喜，一重重思索。人物、历史、悲喜、思索，勾勒出了一个我们曾经经历的难以忘却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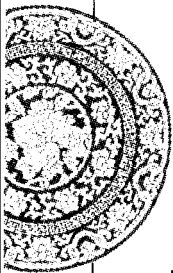
为历史存照



春瑜兄说我是随笔新秀，因为我过了六十岁才动笔，他的话不错。但“秀”字不要，不如换成“人”。新人者，新发表随笔的人也。但这并非说我在写文章前没读过别人的文章。文章还是读过一些。所以说句狂妄的话，自己虽写不出好文章，却还能品味文章的好坏。不少文章令我钦佩、惊喜、省悟、叫绝。但震撼我心灵的文章并不多。有的文章深深震撼我，是因为文章中的人物的遭遇不能不打动良心未泯的人，而他们的遭遇又是很鲜见的，如张志新和顾准，一般人难以遇到。俞明先生写的都是他接触过的人，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我们每个人都熟悉他们，几乎都同他们接触过。但俞明先生视角独特，洞察深邃，以他们的坎坷经历为素材写出的散文却令我震撼，读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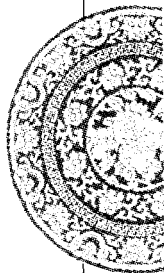
俞明先生的生活经历相当丰富，早年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在上海、苏州一带就与各种各样人打交道，后来又当过共产党的大学的系党总支部书记、市委宣传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对他写的人物十分熟悉，并参与过他们的生活，对他们在革命大潮中沉浮的理解极为深刻，对他们生活的悲惨结局充满了悲悯之情，并从中悟出悲凉的历史教训。

《修斌醉酒》中的修斌是俞明的老熟人，出场时已是“国内高低压开关电器领域的权威”。修斌抗战胜利前夕入党，是个理想主义者，烟酒不沾，在宜兴、武进一带打游



击。后因革命需要考入无锡江南大学，在大学里任团委书记。解放后政治运动繁多，影响学生学习。修斌在支部会上发言，认为不能无休止地开毫无意义的会，应当动员党员带头学习，为建设祖国学好本领，并声明，如支部不采纳他的意见，以后便不参加支部会。这种不合时宜的惊人之语，弄得支部不知所措，只好上报市委。市委书记听了勃然大怒，竟有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党员，决定亲自找他谈话。修斌做惯地下工作，不懂得下级不能同上级争论的浅显道理，不明白思想这东西也讲资格，同书记辩论起来，结果被开除出党。市委书记责令支部组织委员向其宣布。修斌平静地接受处分，只保留自己的看法。开除党籍后他考上南京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分配到东北电业管理局，后调至中央水电部。黑暗年代由他介绍入党的人到了光明年代宣布开除他出党，到了更光明的年代宣布开除他党籍的人又恢复了他的党籍。四十年前修斌的意见并不错，只是超前了，四十年后证明宣布开除他党籍是错误的。修斌酗酒，终因酒精中毒突发心脏病而死。修斌的酒杯中是否有破灭的悲凉，失望的痛苦，被欺骗的悔恨？其中哪种分量最重，又有谁说得清？但我想修斌这样的人我们都遇见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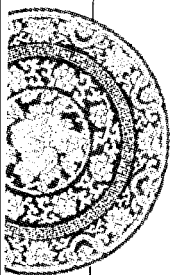
《招手》是俞明的一篇力作，写了三次招手：反革命在招手，新生活招手，死神在招手，具有诗人气质的共产党



员许君鲸便在三次招手下走完自己的一生。

“招手”典出自《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一段按语中最后的一句话：“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招手的对象便是“苏州一同志”许君鲸。老许是何许人？他是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的检查员，1947年入党的科级干部。他的生命一旦被革命烈火点燃便熊熊燃烧，像头不知疲倦的老黄牛，没日没夜地工作。他觉得自己赶上好时代，非得讴歌不可。于是他在工作之余构思长诗《祖国颂》。1951年写好后寄给懂行的文艺界朋友欧阳庄指正，欧阳庄又把胡风的评语告诉老许，老许听了十分高兴，着力修改长诗。不料1955年胡风成了反革命集团头子，毛泽东在按语中写了上面那句话。毛泽东的话的分量无人不知，下面为了自保，不问被招手的人是否招过去了，便按被招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处理了。老许立即被关押，以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后来饿得活不下去了，才被送回苏州天平果园劳动。俞明有一段极富感染力的描述。“四人帮”粉碎后他同几位同志驱车到天平看红叶：

千年红枫在夏天落叶后，长出了新叶，山区的凉意把它们冻得鲜红鲜红，在阳光下发出眩目的色彩，成片的银杏树叶黄得发亮，在风中簌簌飞舞，云一般飘荡在色彩缤纷的世界中，我们正在尽情欣赏，车子拐到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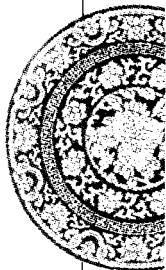


园，空气中弥漫着橘子香气……快出果园时，路旁突然出现一个正在耕地的人，披着一件灰棉袄，佝偻着身子专注地在松土。就是这个穿灰棉袄的人，使我们突然感到从花团锦簇的天地一下子进入到一个孤寂的无生气的世界。

情感变化太大了。那人便是“苏州一同志”老许。老许没有被判刑，所以没有刑期，不明不白地被排斥在社会之外，强迫劳动了二十五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最高领导的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可悲的是不仅老许一个人遭到噩运，很多的人都遭到过类似的噩运。俞明问道：“究竟为什么，要把一个乃至无数个忠心耿耿的人推向反面呢？”其实，他的散文提的都是这个问题，并部分地回答了。其余的部分就有待读者自己思考了。

老许的悲惨结局的感人力量，不下于张志新的壮烈牺牲，因为他这样的人比张志新多得多，所以比张志新更有典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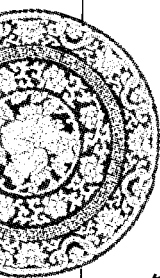
《认命》是一篇凄婉的散文，风格近似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怨而不怒。孙观芳是心地善良的苏州姑娘，因祖父做过驻日本公使便被排除于革命队伍之外。尽管她一心改造自己，但仍无法改掉自己的原罪。她依旧保持善良的本



性，至死不变。她以微薄的收入，用祖传的秘方配药救人。她这样做毫无功利目的，仿佛不能不这样做似的。《认命》是对中国普通劳动妇女的赞歌，也是对流行多年的原罪论的严厉谴责。我们谁没有遇到过因家庭成分不好不能考大学、找不到工作、不能留在城市、不准革命的苦命的同胞呢？

《老严的最后一段日子》写的虽然是一个地下工作者坎坷的一生，也具有普遍意义，千百万在敌人后方为建立新中国而战斗的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都有过同老严类似的遭遇和同样的表现。不然便不会有声势浩大的“抓叛徒”运动了。后来的抓叛徒变成一种政治力量间较量的手段。真正的叛徒抓出几个？被诬陷为叛徒的人有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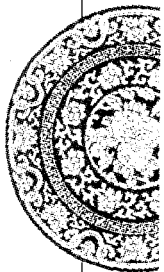
老严在战斗中被押在南京战俘营。战俘营里大队长以下的职务全由俘虏自己担任。老严那时还是小严呢，担任了文书。解放后担任过队长的人在省里当厅长，小严却戴着叛徒的帽子，1957年又凭空加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多年的改造使老严丧失申冤的勇气，像大多数他那样的人一样，只会低头认罪。小严在监狱中，母亲探狱时，出于怜悯，让母亲给关在另一监狱中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周县长送棉垫棉被棉衣外加二十元银洋，周县长才得以过冬。老县长对小严十分感激，但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叫小严。老县长后来嘱咐儿女，小严是他的救命恩人，一定要找到小严，并代他报



答。可到哪儿去找一个不知名字的人呢？

周县长的儿子是位将军，离休后，军区为他在苏州造了一所房子，在此安度晚年。周将军知道有位小严是父亲的救命恩人，一直在寻找。一次党史办宴请老同志们，周将军和老严都参加了。老严喝多了酒，才讲出他给周县长送棉衣棉被的事。周将军听了大为激动，老严的命运也有了转机。工资从二十级升到十七级，退休改为离休。但不久老严便生病住院，医院没把他这小干部当回事儿，发生了医疗事故。死前老严对儿子说：“这是一起医疗事故，你要设法调查清楚，讨个说法。”这大概是老严惟一一次鼓起勇气对错误要求讨个说法。以前他对任何错误都不敢抗争，只会逆来顺受。这不能怪老严，现实把他折磨成这样。为什么我们的革命同志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舌剑唇枪，而在自己人面前对诽谤、诬蔑等不实之辞却只能认罪伏罪呢？老严自己说：“只允许你认罪，辩白是不听的，听了也不信。”这种不让人辩白、不听人辩白的做法由来已久，长期得不到纠正，是游击习气中的长官意志作祟，或是不懂法制惯用人治的结果，抑或是从苏联学来的？然而这种做法制造出多少冤魂啊。

《博士洗澡》写著名化学家吴懋仪女士，哈佛大学博士，回国执教。在美国生活多年，自然养成美国某些生活习惯，比如爱洗澡。爱洗澡并非坏事，今天很多人天天洗澡。但在



五十年代卫生条件差，爱洗澡便在没有卫生习惯的人的眼里变成了新奇事了。吴博士讲穿着，讲礼仪，更让周围人看不惯。但人们却看不到她对科学的执著、对教学的认真。吴博士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行走不便，只能在家里看书。“文革”期间她便在家挨斗，惨状难以描述。洗澡当然成为难以实现的梦想了。临终前吴博士希望把遗体捐给医疗机构做解剖用，因为除了自己的身体她一无所有了。

吴博士的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她死得更惨的知识分子还很多。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则是一种稀松平常的事，没有人会感到惊讶。可怕就可怕在稀松平常上。

俞明先生还写了其他人物，都写得有深度，我称为革命时代众生相。但愿后代能了解他们苦难的经历，悲惨的命运。他们的命运不能再重复了。

真的能不再重复吗？